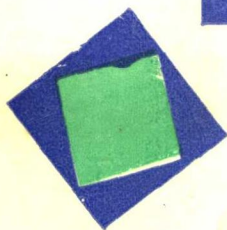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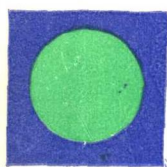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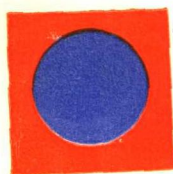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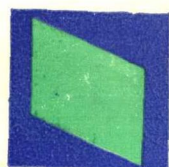


国家“七五”重点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

# 香港社会问题研究

何肇发 丘海雄 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国家“七五”重点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

# 香港社会问题研究

709429

何肇发 丘海雄 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 香港社会问题研究

何肇发 丘海雄 主编

责任编辑: 施国胜      封面设计: 方楚娟  
责任技编: 姚明基 刘叔伦      责任校对: 郑伟贞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8.2万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登记证号(粤)第11号

ISBN7-306-00518-9

C·19 定价: 5.30元

## 序 言

香港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从其外表上来看，它有其世界各地大都市的特征，它有伦敦的古雅，纽约的豪华，东京的繁盛，巴黎的放荡，马德里的情调，罗马的端庄，多伦多的风采。世界有的，它都有，世界没有的，它也有。把香港作为一个社区去研究，无论从它静态系统或动态系统来分析，也是极其多样。在人口上，它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流动人口之多，异质人口之大，可与世界其他大城市媲美。区位上，它虽位于亚洲东南部的一个小岛上，但喷气客机可在16小时内到达世界任何一个大城市。都市化促使四周小城镇不断发展。文化上是东西文化的融合点，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特质相互交错。社会分工与社会组织，发展迅速，社会流动性大，有目的，有计划的社区发展，较缺乏控制的社会变迁在进行。整个社会互动充满了激烈的竞争冲突，也有和谐的合作，协调和同化。

这一个纵横交错的复杂的社会，现在正面临着由一个英国殖民地回归到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巨大的历史转折。因此香港研究成为国内外研究的一个焦点课题。国内研究香港的研究机构也纷纷成立，但大部分研究的

对象侧重在经济或政治。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研究，特别是以社会问题为研究范围比较少见。

社会问题的界定，是很不容易的。有些人理解成为社会的失调，有些人理解成为个人行为影响到社会的发展或共同的利益。这些都可以成为社会问题。本书不在于把社会问题作理论的探讨，只是在香港无数的社会问题中，抓出其中较为普遍，而对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具有较大现实意义的若干问题提出来作实证的研究。但这仅仅是香港万千社会问题中的一小部分，要全面了解香港存在众多的社会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而广泛的调查研究。

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已有百多年的历史。虽然其行政机构是以英国文官制度为模式的，但在殖民统治的官僚中，有来自英国官员的沉渣，也有本地吏使的积淤，使长久以来香港政府与民间的贪污行为部分名闻于世。只是到了70年代香港政府成立了廉政公署，雷厉风行扭转了社会上部分越轨行为，逐步形成了一种奉公守法的风气。这一转变也是为世人所称誉的。香港这一重大社会问题能得到整治，这不单纯是一个政府法令可以奏效，而是通过一个人从幼年到成年长期受遵守法规的行为规范社会化的结果。

香港包括本岛、新界、九龙半岛。面积仅超过1000平方公里，弹丸之地却住有居民近600万人口。人力资源应该是充足的。由于长期殖民统治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香港高等教育只有一所以医科见称的香港大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甚至理科都不受重视，工科也无非

培养一些为本地政府服务的工程人员，缺乏智力投资。因此智力未能得到开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教育才有长足的发展，高等教育、初级教育受到重视，但教育的导向仍未摆脱过去殖民地时代的烙印。但由于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缺乏高科技和人文科学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巨大的工业基地和学术环境。近20多年来，香港知识分子多向往海外深造，但是他们多滞留海外，香港人的智力不能全为香港人所用。这就形成了香港高科技人才的缺乏。另一方面，香港的产业结构是以轻工业中装配工业、加工工业为主，元件的制作工业、机械工业较少。因此，长期以来，香港的工业生产以劳工密集型为主，到70—80年代才逐步向技术密集转型。服务性行业和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当大。1987年两者占劳动力需求65%以上。香港没有广大农村作为提供劳动力的腹地，加以入境的限制，这就使得近年劳动力匮乏。因此香港目前正面临着高科技人才和初级劳动力的双重短缺。

香港政府奉行一套由英国移植过来的文官制度，多年来效忠英国女皇，贯彻英国的殖民政策，使香港的政府机构顺利地运转，发挥香港政府机构的整个功能，香港的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作为香港各级机构公务员，是值得重视的社会群体。他们有共同的群体意识，共同的行为规范。他们其中有从英伦三岛来的英国人（过去还有部分印度人），也有中国人。目前公务员正逐步本土化。这个群体的研究，对未来香港政制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香港学者近年对香港领袖人物包括华人公务员，已

进行科学的研究分析(见 Lau Siu Kai: Institutions without leaders: "The Hongkong Chinese View of Political Leadership" HKIAPS Reprint No.1)。

作为香港社会活动的核心,是经济活动。我们不是研究经济活动所产生的问题,而是探讨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政策如何对自由经济进行干预,特别分析其工业政策对香港工业的发展的影响,探讨其政策的演变,及其对工业发展的预期效果。这将有助于未来政策的制定。香港学者日益对政府干预香港的长期发展计划,控制日用必需品价格,限制市场垄断,防止商业的诈骗行为等经济活动研究及对政府的经济功能进行研究(见 Lau Siu-Kai and Kuan Hsius Chi: "Public attitude toward Laissez-Faire in Hongkong" HK IAPS Reprint No.2)。

本书还包括了香港社会中两个普遍引起注意的**老人**问题和青年问题。香港是个充满着竞争,活动力极强的社会,因此是个青年人的世界。从人口的增长过程中也是从14—64岁劳动人口增加最快,而其中从16—34岁的青年人增长尤为迅速,根据1985年资料的分析,占人口总数的39.4%。根据经济的发展,青年人口的增加,将有继续发展的趋势。青年的各种问题,如偏差行为,犯罪行为就不能不引起极大的注意。

另一方面,根据1985年的统计,香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已占7.7%。已进入老年型的社会。随着出生率的下降,幼年人口的逐步减少,老年人所占的百分比会迅速

增加，老年问题将随着岁月的增长而加重。而经济发展必然急需外来青壮年的劳动力。导致未来香港人口的年龄的结构将会是畸形的。社会对老年人的负担将日趋沉重。香港的老人问题将与世界其他老年社会一样，产生众多的问题。

1997年香港即回归祖国，香港社会发生的问题，可以与我们作比较的研究，这将是极有意义的。值得作比较研究问题很多，我们只选择了社区归属感，教师工作满足感与转行问题和中学生人生价值观等三个问题与内地作比较研究，这将有助于我们今后对香港社会政策的制定。

本书不是对香港社会问题作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只是就与香港社会的发展有关的问题作社会学的研究。

把香港作为一个社区，对它的问题进行研究就不能不作实地调查，运用实证的方法进行分析。为此我们先后派出了两批教师赴港进行访问和问卷调查，深入实地研究，进行现场观察，引证文献资料。所以本研究的过程大部分不同于光靠别人记载的文献加以编汇成文。对香港社会问题这样的实地调查研究，如果没有得到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浸会学院和岭南学院的大力支持是不可能的。在此应该感谢的，除了中国社会科学基金提供研究经费外，岭南基金会亦支付了我们在香港研究人员的食宿费用，我们深表感谢。此外在资料整理、打印

和电脑分析过程中，得到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同学和技术人员罗仰明同志的大力帮助，在此我们一并申谢。

**何肇发**

1991年7月

# 目 录

|     |           |
|-----|-----------|
| 序 言 | 何肇发 ( 1 ) |
|-----|-----------|

## 一、香港的贪污与反贪污问题研究

|                  |                |
|------------------|----------------|
| (一) 贪污问题的产生背景及研究 | 丘海雄 黄 冬 ( 1 )  |
| (二) 反贪污机制的变迁过程   | 丘海雄 黄 冬 ( 10 ) |
| (三) 反贪污机构的功能与特点  | 丘海雄 黄 冬 ( 15 ) |
| (四) 对反贪污的评价与借鉴   | 丘海雄 黄 冬 ( 24 ) |

## 二、香港的人力资源问题

|                   |            |
|-------------------|------------|
| (一) 人口及人才外流问题     | 李若建 ( 33 ) |
| (二) 香港妇女的就业分析     | 李伟民 ( 39 ) |
| (三) 80年代香港劳动力市场回顾 | 李若建 ( 51 ) |
| (四) 90年代香港劳动力市场展望 | 李若建 ( 58 ) |

## 三、香港的公务员问题

|                      |            |
|----------------------|------------|
| (一) 华人公务员的社会背景与工作满足感 | 陈 硕 ( 66 ) |
| (二) 华人公务员的价值取向       | 陈 硕 ( 81 ) |
| (三) 公务员的本地化问题        | 陈 硕 ( 95 ) |

## 四、香港政府的经济政策问题

|                    |             |
|--------------------|-------------|
| (一) 积极不干预政策及其产生的背景 | 黎熙元 ( 110 ) |
| (二) 公共财政政策及其影响     | 黎熙元 ( 113 ) |
| (三) 工业政策与工业发展      | 黎熙元 ( 119 ) |

- (四) 对经济政策变动的分析与预测……………黎熙元 (122)

## 五、香港青少年问题

- (一) 青少年的偏差行为……………丘海雄 (127)  
(二) 青少年的性意识及行为分析……………李觉敏 (144)  
(三) 学生运动……………陈 硕 (150)

## 六、香港老年人问题

- (一) 婚姻与家庭问题……………李若建 (159)  
(二) 对退休生活的适应……………李伟民 (163)  
(三) 人际关系与社会支持网络……………陈 硕 (170)  
(四) 生活满足感及其影响因素……………李觉敏 (178)  
(五) 老年人社会福利问题……………温世伟 (185)

## 七、中港比较研究

- (一) 社区归属感比较研究……………丘海雄 (191)  
(二) 教师的工作满足感与转行意向的  
比较研究……………黄庭康 丘海雄 (199)  
(三) 中学生人生价值观比较  
研究……………丘海雄 刘小钢 (211)

## 一、香港的贪污与反贪污问题研究

本部分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对香港有关贪污问题研究的专著，廉政公署年报，香港的报刊、杂志的报道和评论，宣传广告和国内的一些有关文章进行有系统的整理、归纳、分析，同时结合我们在香港期间实地观察的所见所闻，试图从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及变迁的角度探讨香港贪污问题的社会背景，描述香港反贪污机构和机制的变迁过程、现状和基本特征，指出香港反贪污工作与国内的一些差异，试图从一个侧面客观地认识香港，借鉴香港有益的反贪经验，为我国推进反贪污斗争提供参考。

### （一）贪污问题的产生背景及研究

贪污的英文是“Corruption”，有“腐化”、“腐败”之意。贪污对个人而言是一种行为，对社会而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看则是一种社会问题。贪污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几乎所有的国家或地区都不同程度上受到贪污问题困扰。

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经历了经济和社会的急剧变迁，目前已发展为世界重要的金融和贸易中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贪污问题一度十分突出。与此同时香港也有悠久的反贪污历史，自廉政公署成立以来反贪污成绩令人瞩目，其标志是1987年在香港举行的国际

反贪污会议。

我们选择香港贪污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因为：一是香港主要是华人社区，华人占98%，其文化背景和行为模式与我们有相似之处；二是香港经历了贪污和治贪的全过程，使研究具有完整意义；三是香港治贪机制完善，治贪成绩突出，有正面借鉴意义。因此我们相信通过对香港贪污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研究国内的贪污问题，为国内的反贪污斗争提供有益的参考。

贪污问题复杂，其发生数量与规模难以测量，其原因和结果扑朔迷离，关于贪污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和完整的体系。香港贪污的研究只是在近十几年才有初步的理论假设和框架。从世界范围看，贪污主要有两种形态，因此贪污的研究主要也分两个方面。在美国等一些工商业发达国家，发财机会多而谋取官职不易，其贪污形式往往表现为以财富来获取政治权力<sup>①</sup>，故这些地区的贪污可称为“以钱谋权”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贪污形式大多是以权力换取财富<sup>②</sup>，即以经济贪污为主，可称为：“以权谋钱”型。香港贪污产生于其发展阶段，其贪污类型主要属于“以权谋钱”型，以往香港贪污研究也主要集中于“以权谋钱”型贪污。

李沛良从贪污定义出发把贪污模式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市场中心型”，分析角度是贪污的原因，认为市场供需不平衡，即对政府服务的需求大于供给时，需要政府服务者就会给公职人员提供好处，以换取所需，因而造成贪污。第二种模式是“公益中心型”，分析角度是贪污的后果，认为贪污是公职人员非法提供种报答，得益的是特定部分的公众，而损害公众的整体利益。第三种模式是“公职中心型”，定义角度是贪污的性质，兼顾了贪污的重要原因和结果，认为贪污是公职人员为了谋私利而违背或偏离公职规范和行为。这种模式乃从政府角度出发，最正统，对香港政府

---

①② 广东法学会编：《廉政制度建设专集》，1989。

而言，贪污是公职员为了谋私利而背离香港现行反贪污法规的行为（李沛良，1981）。

贪污问题的研究有两个基本理论观点，首先是认为贪污是传统社会影响的结果，故香港贪污是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影响的结果。该派的代表人是最早研究香港贪污的拉夫别利兹。第二种观点认为贪污产生于政治现代化过程，而香港贪污则主要是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李南雄，1981）。总结这两种观点，前者可称“文化决定论”，后者可称“结构功能论”。

对贪污的影响，大体上存在两方面判断。一方面是贪污造成组织目标的移位，损害组织目标的执行（李南雄，1981），影响社区政治经济稳定（Chow Siu-Nam, 1978；李沛良，刘创楚，1981；王宗礼，1988）。另一方面是贪污同时弥补了科层体制僵化的缺陷，提高了办事效率和成功率，使之增加人情味，并带来工作满足感（李南雄，1981）。

香港贪污研究的重点之一是对反贪立法的研究，概括起来有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对反贪立法和反贪机构作历史分析，描述其变迁过程（Hsin-Chi Kuan, 1981；Ma-Chichuag, 1978）。第二层面对反贪机制作功能分析，特别注重廉政公署的“三管齐下”功能和独立性（Emiti Ho? 1978；Jeremiah, K.H.Wong, 1981）。第三层面的研究把香港社会的政治变迁和政府功能的适应联系起来，对廉政公署的建立过程作原因分析（Chow Siu-Nam, 1978）。

贪污的第一层含义是“腐败”，含有一定的道德判断的抽象性。第二层的含义具体指“受贿”。我们定义贪污为公职人员为了谋取私利而违背法规的行为。香港的贪污可定义为公职人员为了谋取私利而违背香港反贪污法规的行为。关于贪污的法律定义，1971年的香港《防止贿赂条例》规定：“任何皇家公职员若未经总督一般同意或特别批准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将被定罪”。1974

年补充条例把贪污定义从政府扩展到私人机构，即私人机构中未经主管或雇主同意而索取或接受商业佣金亦算作贪污。

我们对贪污具体内容不作分析，而把贪污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及社会问题，采取文献分析的方法，对香港反贪专著、廉政公署年鉴、香港报刊评论、署名文章、宣传广告，及国内有关文章进行整理、归纳、分析，将其置于特定的框架中，在作系统的归纳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些见解。

我们将贪污置于文化网络和社会结构背景中加以理解，并认为香港贪污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种文化、社会背景的适应，但并不采取消极的功能主义态度，以免导致“贪污泛滥不可避免”的结论。我们同时研究反贪污的控制机制和控制手段，这种反贪机制和手段既是对发展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的适应，同时又是对文化、社会机制的良性改造，即是一场“无声的革命”。最后通过分析社会反应来检验反贪机制和手段。

贪污的社会背景包括文化和社会结构，由于廉政公署的成立标志着治贪成功的开始，故贪污社会背景的分析主要放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前。

首先讨论文化背景。最早研究香港贪污问题的学者之一拉夫别利兹认为，香港贪污源于传统中国社会，香港公务员与普遍香港市民一样，甘愿做中国文化的受害者。而一些学者明确反对这种观点，其理由是现代香港社区与传统中国社会相去甚远（李南雄，1981），把香港贪污归究为传统中国文化的产物是一种“文化决定论”。我们不苛同拉夫别利兹的观点，但认为文化因素可通过影响贪污认识而影响贪污行为，而香港贪污确实与香港社区特有的文化有关。

文化因素很复杂且难界定，由于香港居民98%是华人，且大部分为大陆移民，70年代前期的香港文化可称为移民文化。移民文化有四个方面可能与贪污有关。

### 1. 心理惯性

以移民为主的香港公众很多经历了封建和军阀政府的统治，对贪污已习以为常（Chow Siu-Nam 1978）。中国民俗充分体现这个事实。李沛良对与贪污有关的中国俗语进行过研究。经概括这些俗语可分四类：

（1）重视人情关系，如“人情紧过债”、“礼多人不怪”、“礼尚往来”、“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等。

（2）与血缘关系有关，如“兄弟班”、“子民”、“父母官”、契父子、契母女等称呼，它们的特点是把一般的人际关系牵上血缘关系的称呼，实际上是建立虚拟的血缘关系，以示关系亲密。

（3）对法的理解：“法无可怒，情有可原”，及对财的认识：“财可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

（4）与贪污有关的俗语与容忍的价值判断，如“小不忍则乱大谋”、“守得云开见月明”、“百忍成金”、“得饶人处且饶人”、“见人一善，忘其百非”等。

现时的香港仍可发现这些流行的俗语，这显示当时大部分移民都对贪污有接受和容忍心理（李沛良，1981）。

### 2. 过客心态

公众对香港社区的认知还不够，未有社区归属感，认为香港仅是谋生暂居之地，非长住久安之所，故对该社区的贪污问题不关心，加强了容忍心理。

### 3. 经验判断

移民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香港政府亦不例外，特别是部分移民是曾混迹旧社会中国官场的流亡资本家商人，更相信用钱行贿的灵验。

#### 4. 非参与文化

非参与文化表现为以钱代话。70年代以前,香港公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据统计,香港非文盲数1948年是12万人,1972年增加到120多万,但1972年文盲数目仍有280多万,超过当时香港人口的2/3<sup>①</sup>。教育程度低必然带来人口素质低,而人口素质低又带来低的政治参与度。低的政治参与度又导致对贪污的认可和对反贪污的消极态度(Chow Sin—Nam, 1978)。对贪污的消极态度表现在行动上是以钱代话,即不直接表达需求意愿而是通过贿赂中间人来达到目的。不直接表达需求意愿一方面是与参与感低,不想通过正常途径争取所需;另一方面是语言不通,不便表达。当时香港官方语言是英语,本地语是粤语,故官方与公众沟通困难,公众往往通过中下层公务员或非法中间人表达需求意愿,以贿赂来弥补参与感低和沟通困难。

以上移民文化中与贪污有关的四个方面决定了大众对贪污的态度,一方面是旧环境的文化熏陶造成对贪污的认可态度,另一方面是对新环境的不适应而造成对贪污的容忍态度,这种大众态度在当时的一些抽样调查中得到证实。

1971年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在观塘区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公众对贪污的认可如下表(李沛良,1981):

表1—1 贪污的认可程度表 1971 (N=1065)

| 项 目  | 回 答    |         |         |
|------|--------|---------|---------|
|      | 同意 (%) | 未表态 (%) | 不同意 (%) |
| 职员挣钱 | 36.8   | 35.0    | 28.2    |
| 送 礼  | 17.7   | 19.0    | 63.0    |
| 请喝茶  | 45.1   | 22.8    | 32.1    |

<sup>①</sup> 资料来源于《The Far—East And Australia 1974》london.